

擺盪「戰略自主」與「戰略機會」之間：探索 後殖民認同下的印美關係發展

李思嫻*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方天賜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主軸在於檢視國家身分認同因素對印度外交政策長期與深層的影響，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結合體系結構與單元層次的分析架構下，抽取出做為中介變數的身分認同因素是如何干擾印度對於體系壓力的回應，同時提供觀察印度政策選擇的另一種理論途徑。目的在於指出，欲理解印度外交政策具有的特質，必須輔以「後殖民身分認同」的干擾變數，而伴隨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而來的戰略自主，則有助於解釋為何印度對美國總是存有不信任感，雙方戰略夥伴關係難以真正落實。未來印度視印美關係為一個戰略機會（現實主義者）或戰略自主（民族主義者），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可以提供吾人觀察重要線索。

* 通訊作者

關鍵詞：印美關係、後殖民認同、戰略自主性、新古典現實主義

* * *

壹、前言

自2000年以來，印度對外關係日趨自信與活躍，與大國的接觸比以往更加深化與豐富，印美雙邊關係的發展更是冷戰後最受矚目的焦點。尤其自2014年5月印度人民黨取得執政後，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高層互訪頻繁所建立的友好情誼，印美關係被描述為已跨越「歷史的躊躇」（hesitations of history）（Mohan 2016）。給予外界雙方已經成功拋開歷史疙瘩，營造合作無間的親密氣氛。

回首印度自獨立後的外交歷史與實踐，對外政策素有其連續性，特別是保有外交政策獨立性與拒絕軍事聯盟的政策傳統（Miller 2014），長期堅守不與他國結盟之原則似乎呈現結構現實主義下的異例，¹即使面對潛在競爭對手中國整體實力的提升，在應對與周邊國家領土爭議時越趨自信的態勢，以及在印度周邊隱然形成的安全威脅，無疑對印度是一個警訊。然而，印度外交政策弔詭之處就在於，實力的差距以及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邏輯上將加速推動印度與美國發展更密切和更清晰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印度同時會積極把握美國所提供的戰略契機，以趁勢崛起，不過事實卻並非如此。其政策並未隨著結構權力分配的變動，而進行相應的結盟與制衡行為，更遑論中印關係呈現一種不對稱的威脅認知，印度界定中國是未來長時期的戰略競爭者，中國卻不將印度視為嚴重的威脅者（Garver 2003, 109; Fang 2014）。

¹ 最為經典的事例仍是冷戰時期印度「不結盟運動」的倡議。按照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印度應如同其他國家加入任一方的聯盟體系，整體國力虛弱的印度，即使面對和中國逐漸升溫的緊張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1962年災難性的邊界戰爭，卻一直到1970年代始與蘇聯結為同盟關係。換言之，印度靠向蘇聯彰顯體系結構壓力的制約力量，決定印度最終仍無法避免走向結盟；然而，純然由體系結構變數無法更細緻的解釋1950、1960年代印度的政策選擇，以及印度為何選擇蘇聯；同樣的，蘇聯瓦解後，印度失去長期依賴的戰略夥伴，即使印度在1990年代實施經濟改革，融入美國主導的自由經濟體系，然而卻也沒有立刻擁抱美國做為新的依靠。

美國和印度一直至1990年代末才化解長達半世紀的冷淡關係，美國是歷史悠久的民主大國，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龐大的民主國家，在共享的價值之下，印美雙方的合作關係理論上應該是水到渠成，然而事實上卻是充滿鴻溝荆棘遍佈與顛簸的路程。²印度至目前為止的政策似乎顯現出無法全然依權力平衡的原則，建立與美國一致的目標，抗拒任何正式聯盟仍然顯而易見，尤其不願意採取可能被中國視為對抗性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不願充分參與可能會疏遠中國的機制。

直言之，若冷戰時期妨礙雙邊關係的外部因素已不復存在，但何以兩個民主國家走向合作的路程卻仍是如此緩慢？印度長期以來對美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缺乏互信基礎使印度始終抗拒融入美國所建構的戰略規劃中，此種影響印美關係發展的深層因素又將如何系統性的進行理解？以上皆是本文探究的動機。

爲了更明確的論證印美關係的若即若離，本文將以2012年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做爲個案演示。從結構現實主義的制高點，有充分理由認爲印度將積極成爲美國「樞紐」（pivot），視爲體系給予的契機。美國明確指出亞洲「再平衡」範圍涵蓋亞太地區並連結印度洋地區，無疑賦予印度地位特殊的重要性，期盼與印度建立實質的戰略夥伴關係，雙方共同因應中國崛起的效應，美國此一熱切期盼至少目前爲止仍未完全成真。

對於現代印度的理解無法忽視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兩個概念之間的相互作用（Mondal 2003, 44）。上述對於印度外交政策的思索，亦突顯出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並不必然帶來與之相應的國家行爲，純然由體系結構變數並不能完整的說明印度的政策選擇，印美關係的發展必須輔以國家身分認同（national identity）做爲解釋變數，始能更好的解釋印度令人費解的政策行爲。

爰此，爲了更好理解認同因素對於外交政策的作用，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爲

² 例如美國退休外交官Dennis Kux稱印度與美國是兩個「疏遠的民主國家」，參閱Kux（1993）；美國前國務卿Madeleine K. Albright形容印美關係是「一種充滿誤解、誤判與不斷錯失良機的模式」、Henry Kissinger描述兩國在過去的摩擦與齟齬，使印美關係呈現「只能在夢裡出現的美好想像」，參閱Vinod（1997, 439-449）。

理論基礎，本文主張在承認體系力量的前提下，也應回溯古典現實主義關於國家與外交政策的論述，以增補體系因素在解釋力上的缺陷，唯有如此才有助於解釋特定國家的政策選擇，為何並非是受到體系壓力而造成的國際政治結果循環，透過抽取出印度國家內部特性，建立變數之間的邏輯關係，重點在於強調權力分配仍是制約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為了更全面細緻的理解印度外交政策產出，必須連結國家特質做為關鍵的干擾變數補強；接著進行個案檢視驗證，論證後殖民身分認同如何體現在印度對美國政策的回應，最後並據此達成結論，做為觀察莫迪政府未來政策之續與變。

故本文核心論述為，印度民族的共同集體記憶是來自於過去不同帝國統治的歷史經驗，奠定了後殖民認同（post-colonial identity）做為理解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礎。如果將現實主義和身分認同做為政策光譜的兩端，印度外交政策時常擺盪在「戰略機會」和「戰略自主」之間。長期而言，印美關係的漸進發展的確符合體系結構的預測，然就短期而言，印度徘徊在美國所提供的戰略機會與基於戰略自主考量之間，總是無法即時抓住美國所提供的戰略機會，原因並非是因為印度缺乏任何戰略意識，而是由於後殖民身分認同因素發揮了干擾作用，減弱了體系壓力的制約。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下的身分認同與外交政策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關切焦點與核心論述

吾人如何以有別於傳統的途徑來理解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理論究竟是要研究一國實際的外交行為，抑或應該將重點放在宏觀理論的建構，在內部爭論過程中存在緊張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做為兩種論述的橋樑，兼顧理論的嚴謹性和議題的政策相關性之間維持平衡，以增進現實主義理論對外交政策的解釋（Wohlforth 2008, 31）。

Gideon Rose特別冠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之名，來統稱明確建構外交政策理論路徑的現實主義學者。理論基礎萌芽於對結構現實主義的反思與異例的抽絲剝繭，關注國家行為呈現與結構現實主義預期不一致的反常現象，並將研

究焦點轉至國內層次，建立變數之間的假設關係（鄭端耀 2005, 127-129）。言下之意，純粹由體系結構權力分配的論述在說服力上已經受到質疑與挑戰，釐清國家的內部特性如何影響領導者對於外來威脅與機會的評估，以及對外政策的制訂。³結構現實主義主張在體系壓力驅使下，所有國家會採取相似的行爲；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許多案例卻並非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測，國家並非總是依循體系規則行事，而是經常呈現「過度制衡」或「制衡不足」的情況，這些異常案例也因此成爲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的開端。

承襲現實主義一貫脈絡，新古典現實主義仍以國家爲分析單位，然若要更透徹理解一國外交政策，必須開啓「國家」這個黑盒子（Finel 2001/2002, 212-218）。將國家特性或動機摒除在外，置結構於首要以及唯一地位的結構現實主義不論多麼的千錘百鍊，仍面臨無法提供適當預測的侷限，流失了預測的能力。因此，必須重新探究國家的內部屬性，重新對國家的動機做出預設（Donnelly 2009, 42-46）。

就理論定位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仍是屬於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之群中，這是無庸置疑的，是項理論著眼探究更寬廣的涵蓋層面與細節，更高的變數複雜性並不會犧牲體系層次的理論化（Donnelly 2009, 45），從「解釋對象」不同這點而言，兩者其實是互補的理論（Taliaferro 2000/2001, 133）。也並非只是一種權宜措施，甚至是理論退化，只能解釋結構現實主義的異常現象；而是一個合乎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延伸與拓展（Rathbun 2008, 294）。所有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都是結構現實主義者，可比喻爲「玫瑰換了名字仍然芳香如故」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is still a rose），事物的本質不會因換了名稱而有所改變，充分體現在本質上仍歸屬結構現實主義（Rathbun 2008, 297）。解釋國家行爲偏離結構現實主義的路徑並不意味其結果是非現實主義的，只是凸顯該理論能夠提供更豐富和更具體的解釋力（Kitchen 2010, 140）。新古典現實主義站在捍衛結構現實主義的立場，其實是對權力平衡理論解釋力的補強，填補

³ 內部特性包括：國家在政治、軍事方面的汲取與動員能力、國內社會組織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國家相對於社會的自主程度以及菁英、大眾之間的凝聚程度；大戰略的影響包括：國家領導人對國際威脅與機會的評估，以及可能執行的外交政策，亦即有別於傳統權力平衡理論和威脅平衡理論所預測的戰略（Lobell 2009, 1）。

結構現實主義過度忽視國內層次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要點如下：

（一）國家在體系中的相對物質權力分配是國家外交政策模式的首要驅動因素，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外交政策的開端（Rose 1998, 150-151）。

（二）然而，權力的相對分配僅僅是為各國的大戰略提供了一個參數。體系壓力決定對外政策的大方向，但不能決定國家行為的具體細節，即僅僅從相對權力，或者從外部威脅變化的角度，對國家各自大戰略的細微差別與演化進程解釋有限。因此，一種將國際機會、外部威脅以及國內政治制約三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方式，將能更充分的解釋國家戰略的連續性與潛在原因（Taliaferro et al. 2009, 2-3）。

（三）新古典現實主義致力審視「國家」的中介作用。理論假設了一個「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一面連接體系的刺激性與限制性因素；另一面連接國家實際執行的外交政策。試圖解釋單元層次（unit-level）也會限制國家對於體系定律規則的回應。國際權力分配不會自動轉化為政策行為，必須經過國家結構扮演「傳送帶」角色的過濾，從而影響決策者對可能的威脅進行評估，以及確定可行的戰略，單元層次變數同樣具有束縛或促進作用（Taliaferro et al. 2009, 3-4）。

（四）長期而言，國際政治的結果的確反映了國家之間權力的分配；然就短期而言，純然從體系角度很難客觀充分地預測國家將會執行何種政策選擇，相反的，做為中介變數的決策者與國內政治則具有直接影響的作用（Taliaferro et al. 2009, 4）。儘管國內變數在型塑國家外交政策時並不獨立於結構變數發揮單獨作用，單元層次變數仍舊介於體系誘因和國家實際政策反應之間，也因此稱做新古典現實主義。

（五）因此，隨著時間的發展，儘管國際體系可能會使國家對體系約束條件進行正確回應，但這不能解釋國家做出的短期決策，而正是這種短期決策會導致一國安全和國際體系結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Taliaferro et al. 2009, 7）。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如圖1所示。

圖1 新古典現實主義變數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綜上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尋求至少某種程度的預測能力，同時映照出國際事件是眾多因素相互繁雜作用的結果。國家外交政策的範圍和追求，首先是相對物質權力決定的，而此種影響又是間接和複雜的，因為體系壓力必須要通過單元層次上的仲介轉化；其次，以「傳送帶」概念將相對權力分配和國家外交政策連結起來，決策者根據認知權衡後產出政策選擇，意味著短期而言，不同國家的外交政策可能並不是建立在相對權力的客觀評估之上，因此，必須理解哪些國內因素影響結構訊號的傳達。

二、國家大戰略的形成：身分認同的作用

如前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最大特質是重新探索國家層次，尤其回頭從古典現實主義汲取關於理念（idea）的作用做為延伸，試圖重新捕捉理念對於政策可能的影響，亦即體系壓力與單元特性交織下的結果，國內理念做為一個干擾變數，各種單元特質包括身分認同與民族主義型塑了對於威脅的評估認知，最終確立大戰略的基本雛形與方向。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國際結構、國家動機和認同等要素融入現實主義的闡釋中，其實也為制度和認同的角色留下理論空間，從而能更貼近與有效解釋真實的世界。

例如，Jeffrey W. Taliaferro著重討論意識形態和國家推行的民族主義是構成國家權力兩項決定性要素。就此而言，民族主義描述個人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是基於團體成員所共有的文化、種族以及民族認同，相信團體的成員擁有共同歷史，國家的存在仰賴於維護國家的持續生存（Taliaferro 2006, 491）。國家身分認同與民族主義無論在國內政治的對抗，抑或外交政策持續扮演著基本的角色（Sterling-Folker 2009, 108），西發利亞體系的維持是建立在民族自決

的集體認同之上，所以國家領導人會不斷重複國族主義、認同以爭取對於政策的支持（Sterling-Folker 2009, 111-115）。

Nicholas Kitchen嘗試將理念發展為一個共同的（具通則性的）干擾變數，描述國際體系的壓力是如何經由國家轉化為外交政策的產出（Kitchen 2010, 117）。新古典現實主義指出國家行為偏好來自利益的驅動，但利益本身其實就含有理念的存在。理念牽涉到威脅的評估認知以及動員能力，進而影響大戰略的形成（Kitchen 2010, 123）。理念反映一國的特質或者稱為單元的特性，具體展現則是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兩者關係緊密相連，但並不同，由國家推行的民族主義關注於個人對民族和國家的身分認同，相關論述如下（Kitchen 2010, 133-135）：

（一）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多元變數的援引，體現了國家決策不僅受到如權力、安全等國際體系外生因素（exogenous systemic factors）左右，也同時受到文化、意識形態偏見、國內政治考量以及占主導地位的理念所影響。

（二）定義國家安全威脅與戰略評估：結構現實主義由國際體系的結構和物質性權力做為其衡量國家利益與威脅的出發點；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家的戰略估算，物質因素絕不是評估國家安全的唯一既成事實，國家對於利益安全的評估可能來自於特定的歷史，意識形態，政治或理念偏見。

三、印度國家特性：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

身分認同可以理解為我們國家是什麼？我們國家代表著什麼？國家身分認同非靜態的模式，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透過與其他國家相互作用進行調整，以及通過自身文化和國內環境，國家身分認同也因此具有關聯性和社會性的特徵（Ashizawa 2008, 571-576）。認同是一種多面向與變動的概念，就印度而言，身分認同有其長遠歷史和文化基礎，涉及了不同地區、語言、性別與種姓制度認同論述，呈現多元認同論述的特質（Commuri 2010, 44）。在歷史的長河中，印度一直在調和種種分歧與差異，這些異質性在不斷融合的過程中，由此造就印度具備一種「統一體」（unity）的精神現實（張淑芳 2007, 3）。

印度在1947年取得獨立之前，大部分時期為一個鬆散集合體，經歷過多次

改朝換代，最後進入英治時期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使印度內部呈現分化的現象，獨立之後又經印巴分裂，才初略完成了印度國家的整體統一。⁴印度廣袤的土地歷經多次侵略與政權更迭，集結多種語言、宗教、文化、種族以及戰略要地的交會點，這些「遺產」延續至今，成爲一個印度教占多數但國家身分認同有待建立的國家。⁵上述差異使印度長久以來難以凝聚共有的國家身分認同。在國家身分認同建構過程中，反抗外國統治勢力與壓迫的共同經歷與感受，構成整體身分認同之主要基礎（石忠山 2006, 5）。換言之，印度的國家身分認同是做爲一個文明古國，文化的資產使其在國際事務上容易呈現脫離現實環境的傾向，同時伴隨著殖民遺緒，進行著反殖民主義的掙扎（Chacko 2012）。

印度前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言，做爲單一的政治實體，「一個印度」（One India）是一個包容性和開放的社會，具備多元文化、民族、語言等理念（Twining and Fontaine 2011, 193）。印度是一個將種種矛盾總和聚在一起的地域概念，融合不同類型的民族、數以千計相互難以理解的語言、多變的地形與氣候、宗教和文化習俗的多樣性，加上古老神話傳說，這些特質皆是具有現代性與普遍真實的存在，都是構成印度的一部份，印度的國家身分認同奠基於「多元性的統一」（united in diversity）（Tharoor 2006, xv, 7）。因此後殖民身分認同的概念有助於探索印度外交政策對象和目標之間的關係（Mehta 2009, 210）。

學者Pratap Bhanu Mehta挖掘「印度的理念」（idea of India），探索印度內在價值的動態連結以尋求對印度外交政策的理解。其認爲，印度自身一直有強烈的天命命運或者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的理念，映照出印度謹慎的政策主旨，一方面不願輕易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則是不加入任何長期持久性的聯盟關係（Mehta 2011, 97-109）。另一方面，英國殖民統治對印度產生兩種遺緒，一是受害者情節深植於印度對外界關係的評估；另一則是印度自視繼承

⁴ 詳細歷史參閱：吳俊才（2010, 87）；陳琦郁（2011）。

⁵ 例如作家V. S. Naipaul以「受傷的文明」（wounded civilization）道出印度過去所承受的內憂外患陰霾，印度社會裡所存在的混亂與矛盾，反映出後殖民社會企圖找尋自我定位的特徵，如今是力抗「印度再裂解」的時代。請參閱杜默（2013, 16-20）。

英國光榮孤立的外交傳統，奠定印度政策菁英尋求實現「大國地位」的基本前提（Hilali 2001, 742）。殖民統治的陰影和大國地位追求密不可分，避免屈從於其他大國一直是印度外交政策最重要目標之一（Ciorciari 2011, 64）。

印度自詡亞洲第一個擺脫殖民統治的大國，構築其世界大國的想像（Chacko 2011, 178-195），重新喚起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想望（Ogden 2011, 4），輝煌歷史與獨特傳統、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世界觀與殖民統治的經驗，這些元素觸動印度的大國覺醒，大國形象立基於道德的象徵，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皆可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中得到解放，實踐反殖民主義的理想（李思嫻 2015, 88-91）。

印度兩大政黨國大黨與印度人民黨的外交政策其實同樣具備後殖民主義的特質，對於西方所造就的現代性小心翼翼的同時，強烈主張保有「印度」認同的獨特性（Chacko 2011, 166）。⁶民族主義者對於印度是否有能力在外交政策上保持自主行動是極為重視的，在不同的時間區段裡採取不同的政策展現戰略上的自主。2009年9月，時任印度外交部長的S. M. Krishna指出，印度的主要目標是確保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鞏固印度的戰略自主權。民族主義者往往看到印度的利益經常受其他大國（通常意味著美國）壓力下被壓制，外交政策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是一個衝突的場域，在這當中主要大國不斷尋求抑制印度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迫使印度政策遵循其他大國的利益（Ollapally and Rajagopalan 2011, 146）。

由此導致喪失外交政策獨立性是印度恐懼的主要原因，民族主義者反對任何聯盟，並視聯盟為顛覆印度利益的一種方式。2010年9月，當時的印度總理辛格曾言：「印度太大以致於無法被置入到任何聯盟關係當中。」，做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價值，印度認為聯盟（或是與大國的親密關係）是一種制約，而不是分擔安全責任的方式，解釋了印度政治菁英對大國（尤其是美國）長久的懷疑。這並不意味著印度與其他大國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而是說，這種共同

⁶ Priya Chacko認為，核武議題顯示了後殖民主義的特性，印度人民黨在1998年正式公開核武試爆之深層原因，其實是對於西方國家壟斷核武的回應，反制西方大國對其「戰略自主性」的破壞。

利益是針對特定議題，非一般通則的利益。因此，民族主義者傾向於以個案的方式為基礎進行外交政策合作，而非長期配合某種固定的同盟關係（Ollapally and Rajagopalan 2011,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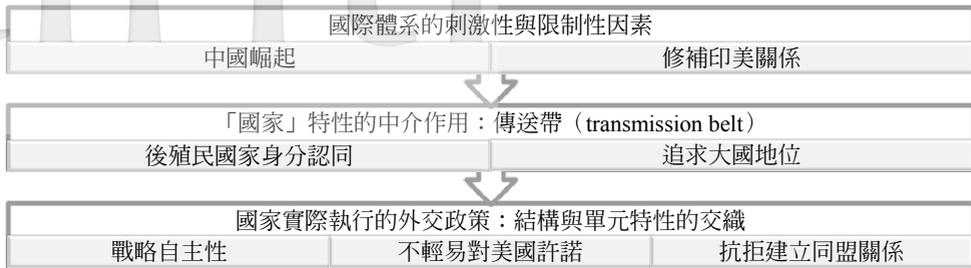
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教授研究結果亦指出，印度不斷遭受異族征服統治的歷史而導致不安全感，內部多元特性的共同經歷是受殖民統治經驗，建構印度的統一性亦是立基於後殖民身分認同。這種造成印度國內集體創傷的產物，塑造印度回應國際關係的方式與行為，成為民族主義政治菁英的集體回憶，創傷受害記憶根植於印度菁英的世界觀，關切自身領土主權以及提高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是必然的結果。印度有著榮耀文明和屈辱的殖民地歷史，遭受殖民的經歷造成了印度國家身分認同轉變，身分認同轉變又進一步影響政策制定（Miller 2013, 1-6）。

殖民經歷是一種民族集體創傷，這種創傷混雜著被侮辱的記憶以及對壓迫的反感，在感受到「國家主權受到威脅」的催化之下，容易產生受到外國壓力的受害心理，從而影響外交政策，這也是為什麼難以由傳統權力平衡理論所預測的制衡或者扈從行為剖析印度外交政策，對於戰略自主的堅持使其政策常呈現「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發展（Miller 2013, 7-34）。

無庸置疑，優越的印度文明構成印度興衰的重要部份，殖民統治的共同集體記憶使印度視自身國家的崛起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道德義務，民族主義做為一種手段與目的，目標是達到國家的自立和自強，同時也能應對外來的威脅，重視國家主權的保護，並經常感知其他國家潛在的敵意，對國家之間的聯盟關係自然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在聯盟關係中擔任次要角色時將有辱民族自豪感，因此強調聯盟將喪失國家自主權的缺點，後殖民國家認同所彰顯的民族自尊心和珍惜獨立地位的情結。

本文研究設計如圖2所示：（一）印度「大國地位」的想望與抱負根源於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的型塑。國家認同所形塑出的民族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構成了印度最鮮明的國家特質，國家身分認同意義了民族主義的重要價值，由此產生以「戰略自主」為核心的政策支柱。印度在國際體系崛起過程中，同時夾雜對目前國際體系秩序相當程度的猶豫，印度期盼感受到其他行為者給予關注與其認為應該得到的榮耀與尊

圖2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印度外交政策的結合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重。「大國地位」與「戰略自主」實則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印度渴求的是維持行動上的自由，能夠自由採取其首選的外交政策追求國家利益，而不受其他國家以任何形式施加壓力有所限制，擔憂國家政策選擇的獨立性遭受侵蝕破壞。（二）國家身分認同之作用使印度外交政策擺盪在「戰略機會」與「戰略自主」之間。國家身分認同型塑印度「戰略自主」以及「大國地位」情節，並據此定義其國家安全威脅之來源。具體而言，印度如何評估或者認知國際體系中的威脅與機會，必須結合國家身分認同這一中介變數，始能更好的解釋印度偏離體系結構預測的政策行為，釐清印度對美國信任不足的根源。

本文並非是獨尊認同因素的作用，而是在於指出身分認同因素與印度外交政策的選擇是密切相關的。更確切而言，身分認同引起的內部競爭和外部刺激促進了民族身分的形成，進而影響和重塑對外政策，體系的權力分配僅僅反映了國家之間權力強弱對比的結構性矛盾，確立了各國所面對的戰略環境；然而無法針對國家的政策選擇提供充分解釋。從身分認同的作用而言，印度如何協調印美關係，深受印度國家身分認同，以及對美國權力本質和偏好態度為前提條件。

「中國崛起」所彰顯的體系壓力決定了印度修補與美國外交關係的大致方向，在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中介變數干擾下，由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喚起民衆的民族主義，解釋了印度與美國進展緩慢，呈現兩條路徑並存的現象，即擔憂中國崛起、與美國合作卻又不與之結為正式的旨在制衡中國崛起的同盟關係，

為更清楚說明本文主旨，以下將進行個案演示與論證。

參、個案演示與論證：2012年美國歐巴馬時期「重返亞洲」政策

一、冷戰後國際體系結構的轉變：中印競爭關係的結構性因素

兩極體系結構的改變形成印度最大的挑戰與契機。蘇聯瓦解使印蘇結盟對抗美國、中國與巴基斯坦情勢獲得緩解，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使巴基斯坦在美國的戰略重要性明顯降低，美國對巴基斯坦戰略的改變減輕了印度的安全威脅，重新連結印美關係的發展（馬加力 2002, 131）。另一方面，1990年代後期國際焦點主要集中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效應和對於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中國與印度相繼在亞洲地區崛起，引起外界探究的關鍵問題在於中印關係是否能夠成為合作夥伴抑或朝向競爭對手發展，對於區域和平與穩定將如何調節（Gandhi 2007）。值得玩味的是，目前為止中印彼此之間呈現一種「不對稱的威脅認知」（Asymmetrical Threat Perceptions）特徵，成為目前描述中印關係和平與衝突的關鍵概念（Garver 2003, 109），凸顯的是印度深覺中國崛起是對其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界定中國是未來長時期的戰略競爭者，中國卻不將印度視為嚴重的威脅者（Fang 2014, ix）。1962年的邊界戰爭使雙方關係惡化，籠罩在互不信任的陰影之下（Wang and Deepak 2012），相互敵視的氣氛延續至冷戰結束仍未消滅，競爭的場域反而進一步由雙邊拓展到區域和全球層面，並繼續爭奪在亞洲地區尤其南亞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Jain 2004, 253）。

從中印目前的發展態勢觀之，兩國的競爭議題呈現多重面向，地理範圍更從邊界延展至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平衡中國崛起的壓力以及其所夾帶的強大經濟影響，成為驅動印度與美國重新修補雙邊關係的動因，尤其美國正在塑造印度在亞太地區圍堵平衡中國的角色，印度和美國已經發展出相較以往更為積極的戰略合作關係，此舉在某種程度上，賦予印度對亞太地區事務更多的份量（Brewster 2012, x）。

從體系結構權力分配的角度而言，關注的是亞洲是否能夠同時容納中國和印度的戰略目標；對印度而言，防止中國勢力拓展到印度洋地區，同時，為爭奪孟加拉灣的自然資源，擔心中國的崛起將威脅到印度地位的提升，兩國終將不免引發敵對衝突行爲（Malik 2001, 73-90）；加上近幾年因邊界問題使衝突再度升溫，對於中國在全球迅速崛起亦始終保持密切的關注（Curtis 2008）。在歷史包袱的催化下，印度和中國在戰略合作方面存在分歧（Singh 2011），隨著中印兩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將導致其追求更加具有企圖心與潛在對抗性的外交政策，進入相互競爭的局面（Singh 2012, 139）。2017年6月中旬發生在喜馬拉雅山地洞朗地區對峙事件可說是繼1962年以來兩國最嚴重的衝突。

兩國同時視彼此為在東南亞地區、中東地區與非洲地區互別苗頭的對手。印度關切中國尋求加強其在東南亞的地位，因而有「東向政策」的制訂，參與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和戰略關係。中印在南亞地緣政治的競逐，以及在印度洋周圍的軍事部署，中印關係的權力鬥爭實際上凸顯了體系結構制約的大致方向，由此預測了兩國未來正面交鋒的可能性（Athwal 2008）。體系權力分配決定了中印之間衝突的結構性因素，隨著印度崛起，中印之間的紛爭已經從雙邊議題的爭議提升擴大到地區甚至全球層次的競爭關係，防範中國構成了印度與美國擴大戰略關係基礎的關鍵因素。中印之間無論是「中印大同」或是「龍象之爭」，⁷都是凸顯兩國未來可能的矛盾。

二、2012年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

歐巴馬在擔任美國第二任總統時期，2012年1月曾在五角大廈以「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建設的優先要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為題，宣布名為《國防戰略指針》（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 DSG）的美國國防新戰略。此一新概念在於「重新平衡與改革」（rebalance and reform）美國在全球的兵力部署與資源分配，以因應急速變化的國際安全環境與日益嚴重的財政負擔；同時指出，美國

⁷ 關於印度對中國政策之細部討論可參閱：陳牧民（2013, 155-173）。

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無法與亞太、東亞，以及印度洋的弧形區域發展區隔。在戰略選擇上，代表美國重歐輕亞的政策轉向，具體整合了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與轉向亞洲（Pivot toward Asia）的軍事作為（閻鐵麟 2013, 34-35）。

外界因此初稱為美國「重返亞洲」，但隨即歐巴馬政府宣稱美國從未離開過亞太地區，如今僅是針對亞太情勢發展，採取新的措施以強化美國對此區域之地位與影響力，維繫既有秩序於不墜，故此新措施實屬針對亞太地區之「再平衡」（rebalance）政策。歐巴馬政府透過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等部門向外界表達美國將從軍事、外交、經濟政策三方來強化美國在亞太區域扮演之角色，如此做之目的在於確保美國在塑造亞太地區秩序及其未來的過程中，能夠扮演更大且是長期性的角色。「再平衡」政策界定之亞太地區範圍涵蓋太平洋及印度洋兩大海洋，與傳統上僅指環太平洋沿岸國家所構成之區域不同，重要特質分別是重定軍事優先順序和軍事部署，以及將印度洋沿岸納入亞太地區範圍等更具整體性的區域策略（張登及 2013, 53-98）。

「再平衡」政策的戰略構想是歐巴馬時期對亞太地區大戰略的總稱，確任此區域做為美國地緣戰略的重點，旨在提升戰略能力，以便在該地區建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權力平衡狀態，政策刻畫出做為反中國的戰略屬性（Mehta 2014）。鑑於印度洋與太平洋在航運及戰略關係上日趨密切，美國相應的支持印度「東向政策」，保障連結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海上運輸線安全（李明 2013, 11）。主張亞太地區是美國21世紀主要的發展關鍵，是時候轉向以亞洲為中心（it is time to pivot to Asia），當時相關論述的提出亦使得此項政策充滿軍事意涵（Paal 2012, 6）。

三、美國期望中的印度角色

無論是稱為「轉向亞洲」抑或「亞洲再平衡」的美國亞太大戰略，同樣再次重申印美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性（Clinton 2011, 56-63）。將印度列入「印度洋-太平洋」整體戰略規劃中，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美國更寬廣的戰略選擇，研擬如何塑造印度在此項戰略擘劃中發揮穩定經濟和安全架構的關鍵作用，說服印度更緊密地配合與美國、澳洲和日本的政策一致性，期望印度扮演「安全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維護印度洋海上運輸路線與印度洋地區

穩定的作用（Scott 2012, 85-109）。在2012年提出「再平衡」政策之後，美國特別強調印度的特殊性，除了既有的聯盟國之外，印度是唯一被美國列為「戰略伙伴」的國家，對美國而言相當於「準聯盟」的盟友。美國將長期支持與印度的戰略伙伴關係，為更廣泛的印度洋區域提供安全保障（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2）。

隨後，2012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進行國防戰略宣傳亞洲行，當中也安排首次到訪印度，與時任印度總理的辛格會面，同時推銷美國所設想的，有關於印度在其亞太戰略中的角色以及可能顯現的作用，Leon Panetta提到，美國將擴展軍事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從西太平洋、東亞延伸至印度洋與南亞區域的弧形存在，與印度的國防合作是整個亞太戰略的關鍵，印度是本地區和世界上最大的、最具活力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有能力的軍隊之一，相信印美雙方關係能夠更具有戰略意義、更實際緊密具有協調性的合作（Panetta 2012）。對美國而言，印度在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具有關鍵地位，美國鼓勵印度拓展「東向政策」，希望印度在亞太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符合美國利益，除了先前歐巴馬訪印，呼籲印度不要只是東向，要「向東參與」（engage East），以強化區域繁榮與安全，此次美國國防部長同樣再次強調印度在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性，以及美印國防合作是美國新戰略的關鍵（方天賜 2014, 17）。

再以美國每四年出版一次的國防評估報告觀之，2006年的報告中，美國定義印度為「新興的崛起大國」（emerging as a great power）；在2010年稱其為「安全淨提供者」；2014年報告反映了對印度的興趣日益增加，指出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從西太平洋和東亞至印度洋地區和南亞地區的弧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美國投資於與印度長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支持其能力成爲一個區域經濟的穩定力量和印度洋更廣泛的安全提供者（Chanramohan 2013）。換句話說，美國稱呼印度為「再平衡」政策的戰略合作夥伴與關鍵國家，有助於解禁先前嚴格控制的防禦技術轉移，依據「國防貿易和技術倡議」（Defence Trade and Technology Initiative, DTTI）更加務實的參與，雙方正式由過去武器買賣關係，轉變提升到實質性的「合作開發和合作生產模式」（co-development and co-production model, CDCP），鼓勵高技術聯合研發

(Upadhyay 2014)。毫無疑問，美國看待印度是「再平衡」政策西太平洋的基石，在美國亞太盟友關係中，將印度視為新進的成員，可以發揮抑制中國崛起野心的夥伴，美國也預期印度將同樣渴求與美國的接觸和行動政策上的融合。

四、印度關於「再平衡」政策的回應

按照現實主義的路徑，在美國官方如此強烈的表態之下，印美國防合作關係應該受到印度熱情回應。然而相反的，印度國防部針對扮演美國制衡中國的「關鍵角色」的回應幾乎是冷淡的。相較於擁抱美國這種可以視為提供印度發展歷史契機與空前機會的言論，印度針對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的發言卻呈現與預期相反的表態，在簡短的聲明中指出：「印度必須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架構，並且在運作的過程中不應讓任何有疑慮的國家感到不舒服。」(Ollapally 2014a, 140)

印度駐美國大使Nirupama Rao在美國布朗大學發表題為「美國轉向亞洲：印度的觀點」的演說，採取同樣的立場，以下談話可視為是一種對「樞紐」角色含蓄的拒絕：

談到印度自身歷史與亞太地區，在印度看來，這是超越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概念，是一種地緣文明的典範，文明的匯集使衝突沒有空間，印度以此做為未來的指引。論及『樞紐』(pivot)與印度的角色，許多觀察者認為印美在亞太地區的交往是針對中國而來，印度不認為這樣的臆測是有可信度的，亞洲的權力協商是要求有關國家之間的相互適應，也是一種包容性的平衡，在其中美國也同時從事與中國、印度、日本和俄羅斯所有地區大國的合作，以實現一個多極秩序，降低軍事對抗的風險(Rao 2013)。

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Shiv Shankar Menon支持對亞洲多元權力協商的想
法，並直接駁斥美國試圖在印度洋地區擔任平衡者的倡議。Menon直言：

只要有機會，任何大國都傾向擔當平衡者的作用，擁有優勢權力的美國如今政策重心正重新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轉向聚焦亞洲，並且驚覺亞太地區權力態勢已有相當大的變化，因而發現印度對美國自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然而，像印度這樣具備經世致用傳統的新興國家，無論多麼優雅的表達，也不讓自己繼續成為別人政策的追隨者，真正的亞洲權力協商是包含在亞洲地區有重要的海上存在和利益的美國，以應對在全亞洲海洋的海上安全問題，並推動建立一個多極亞洲（Menon 2010, 15-21）。

印度高階退役軍官Arun Sahgal亦指出，印度不希望捲入任何非自願選擇的衝突中，排斥以任何形式被連接到美國的圍堵政策中。印度應在「戰略自主」的概念下追隨獨立的政策，印度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保持其「戰略自主」的前提下，與中國進行交往同時與美國維持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Sahgal 2012）。印度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國防研析機構」（the 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針對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的發言，表明：「很難顯著看出美國『再平衡』政策對印度的吸引力。即便美國將支持印度崛起，然而，印度的戰略規劃仍將謹慎的擁抱美國，印度不希望捲入美國旨在遏制中國的『再平衡』政策。」（Gupta 2013）。

從上述發言來看，對於任何旨在圍堵中國的政策言辭，亦避免充分顯現印度擔任美國樞紐作用的想法，並且表示美國長期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在面對抵禦中國的制衡行為時，仍應保持對亞洲其他國家行動的自主權（Ollapally 2014a, 141）。

最後，觀察莫迪執政以來，除了頻繁外交出訪深化與各國關係之外，其上任之初，整體政策最顯著的成功是2015年印美關係急劇進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合作階段（Sajjanhar 2016）。但深入觀之，莫迪親近美國意在取得美國支持印度的能源需求，同時融入「核供應國集團」，擺脫昔日不被承認的核地位（Kazmin and Dyer 2016）。至少目前為止印度並無意追求與美國正式結盟，若將目前印美關係的強化視為聯盟的暖身，無疑是錯誤的解讀，印美固有分歧仍然存在，只是捕捉到加強合作的機會，在意識到外交關係存在

限制情況下，以合作的方式重新處理印美關係。如印度外交部次長蘇傑生（S. Jaishankar）所言，印度正試圖調整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往「領導力量」（leading power）邁進，承擔更廣泛的全球角色。由此而言，印度其實仍保有不結盟的特質，只是中國崛起創造美國和印度結構性機會，以更緊密的合作共同追求自身利益（Ayres, Kaye and Nye 2015）。換言之，一系列的高層互訪與聯合軍事演習是爲了爭取美國支持，實現走出南亞的大國政策，莫迪仍是延續以往的外交特性，只是風格手段有異。

肆、「戰略機會」與「戰略自主」之抉擇：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的作用

就理論與現實層面而言，印度與美國面臨的戰略環境是中國的崛起，雙方可以因此尋找共同的戰略動機，一方面是美中兩國在全球與亞太地區的權力競逐與權力平衡態勢；另一方面是中印在亞太的較量，結構現實主義的原本假設提供了強大的邏輯解釋。尤其自2000年開始，印美對雙方的想法開始明顯轉變，皆是著眼於中國崛起所引發軍事經濟的意涵，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對印度而言，如果將因此形成一個以中國爲中心，受控於中國的亞洲將是最不願意看到的狀況，更不用說雙方懸宕已久的邊界爭議。

基於中印雙方不對稱的物質權力，在戰略的考量上，印度理性思考下應毫不遲疑的靠往美國。尤其在亞太區域，印度對於成爲美國亞太政策的「樞紐」（pivot）角色應呈現相當正面與積極的回應，與中國的關係也將更堅守分際，避免中國利用經濟聯繫而施加其政治影響力於印度，創造操作空間；然而，印度無視於可能導致國家安全受損，反而與中國尋求經濟上的互賴，某種程度而言，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預期卻無法充分展現。

一、「戰略機會」：有利印度大國崛起與國家安全

站在響應「天然盟友論」，美國和印度有許多共享價值足以使兩國更容易在事實上結成聯盟關係，同樣爲多元化的民主國家，使印美攜手合作具有獨特優勢（Bajpai 2008, 33-47）。印美兩個國家都是英國前殖民地、兩者官方語言

皆使用英語、皆為世俗國家、在美國為數龐大的印度裔人數、同樣面對伊斯蘭威脅以及中國崛起的效應（Craig 2013, 70-71）。

中國崛起和美國的應對之道可以說開啓印度的地緣政治契機，這種發展使印度的外交政策更有揮灑的空間，由冷戰時期過於空洞的口號轉變為更踏實的治國原則，重新連接繼承過去的戰略傳統，尤其在911事件後，美國政策的轉向其實與印度在21世紀成為亞洲大國的願望完全相契合（Banerjee-Guha 2011, 223），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更是呈現印度絕佳的地緣政治機會（Ollapally 2013, 46）。

鑑於自身致力做為發展中國家領導者的自我形象，印度將很難接受在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秩序中充當次要的角色，以及處於一個由中國制定和執行規則的國際體系（Mohan 2013b）美國的目標是要獲得穩定的盟友，並將協助印度崛起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國地位」，為印度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提供歷史新頁。美國「再平衡」政策有助於印度提升在南亞地區的國際地位，迫使中國更為尊重的對待印度，縮減中印雙方不對稱的威脅認知差距，為此，印度不能僅僅依靠內部平衡模式應對中國的崛起；反之，學者C. Raja Mohan呼籲印度必須尋求美國及其亞洲盟國進行外部平衡的策略（Mohan 2013a, 25）

從結構現實主義的邏輯角度，無論是基於權力或意圖的平衡態勢，亞洲地區的權力平衡變化提供印美擴大戰略夥伴關係的機會，至少在鄰國安全威脅方面，印度藉由印美關係的接近，有助增加印度應對巴基斯坦和中國潛在隱性聯盟的籌碼。從2001年以來，美國持續對印度釋出善意，小布希開啓與印度走向戰略夥伴關係，2005年公開支持協助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政策目標，接著透過《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協議》，美國等於間接承認印度在不加入《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的前提下，成為合法擁核國家，倡議印美基於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天然盟友論」。

歐巴馬政府在「重返亞洲」中對印度寄予厚望，2013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Thomas Donilon在紐約發表「2013年美國與亞太關係」（*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演說宣稱：「美國與印度在亞洲太平洋的利益正強烈的匯聚中，印度能做的很多，能得到的更多」。印度被視為抑制中國崛起的天然屏障。小布希和歐巴馬皆是著眼於中國因素（體系結構的壓力），就戰略

機會而言是絕佳的機會，畢竟印度一直忌憚中國對印度洋展現野心，對於抑制中國在亞洲的野心有共同利益，印美關係的急速成長有助於印度大國地位被認可，中國崛起刺激印度追求與美國更為建設性的關係（Pant and Joshi 2016, 8-41）

簡言之，美國試圖連結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為一戰略整體，印度也具有潛在的實力能夠平衡中國，對美國和其亞洲盟友而言，「印度崛起」並未帶來如「中國崛起」般負面的意涵，除了印度被認為是人口最多的民主政體外，崛起的印度可發揮牽制中國的功能；就印度的立場而言，印度與亞洲國家在文化的差異，以及戰略上的隔閡這些因素交織作用下，即便近幾年印度經濟獲得可觀的成長，然其所能夠投射到亞洲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相當有限。因此，印度必須藉助與亞太區域國家的合作來施展其影響力，最關鍵的是取得與美國的合作。

二、「戰略自主」：印度戰略獨立性的維護

美國決定拉攏印度是由平衡中國崛起的願望所驅使，然就印度立場而言，並不允許自身被利用於美國的戰略野心之中（Mahbubani 2011, 24）。換言之，印度對美政策的潛在認知與政策反應必須探究印度國家身分認同的作用，如何解釋印度沒有完全符合美國預期的矛盾心理，在結構變數之下，必須輔以單元層次變數，瞭解主導印度政策根深蒂固的思想。

印度在冷戰後雖然不再領導「不結盟運動」，但仍試圖避免陷入對大國片面依賴關係中（Thakur 1992, 165-182），主要導因於印度外交政策關於後殖民和非干預的歷史特質（Mohan 2007, 99）。印度外交政策核心價值最重要的還是在全球政治場域上保持「戰略自主」的概念，「戰略自主」誕生於殖民創傷和感知偉大文明的特定交會，是民族主義最強烈根深蒂固的思想，實際上也是整個國內不同政策流派對於國家認同的共鳴。政策考量不只是純粹以經濟或戰略利益為主，國家認同有其根深蒂固的長期影響，尤其擔憂美國會破壞或毀損印度國家身分認同的特殊危險（Ollapally 2014b）。由此可以理解印度在歷史上甚少結交聯盟之故，領導人尤其謹慎應對任何與美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主要避免成為小跟班（a junior role）的角色，堅持戰略自主權，以及抽身

於美中之間的衝突（Ollapally 2013, 47）。

從表面上看來，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對印度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戰略機遇期，中美對抗的趨勢可以終結印度過去對亞洲地緣政治的長期隔離，並提供印度機會晉升為區域權力平衡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毫無疑問，印度亦一直試圖平衡中國力量，與美國擴大安全合作，這些發展方向皆指明意圖制衡中國的意涵；然而，當美國終於提出明確的制衡策略，並敦促印度在亞洲採取相應的政策回應時，印度卻又顯露模糊（ambiguous）的信號，既不公開支持亦不嚴厲批評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Mohan 2013b）。

學者Stephen Burgess認為限制印度回應美國「再平衡」政策主要涉及兩項核心思考：首先，是印度的「戰略自主性」，意味著印度領導人如履薄冰不願被歸類於美國的同盟關係，印度政策制定者一致強調戰略自主的重要性，印度願意繼續與美國在確保印度洋航行自由方面合作，但在軍事合作方面，不覺得有必要從合作夥伴向正式的聯盟關係移動；第二個因素則是印度對美國「再平衡」政策可信度的疑慮。從過去紀錄觀察，例如，日本和菲律賓與中國就領土要求發生衝突，印度認為美國並沒有盡到對盟國的援助，再者，印度認為美國削減預算可能減少後續對「再平衡」政策的規模與投入的資源。況且隨著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的進行，印度擔心美國可能在其盟友不知情的狀況下，與中國的交易涉及盟友的利益。最後，美國「再平衡」政策意味著美國將更少關注和制約巴基斯坦（Burgess 2013, 4-8）。

儘管美國一直試圖淡化「再平衡」戰略的中國因素，嚴格來說，此項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願望，基於共同的利益，能更務實的型塑印美密切夥伴關係和在亞太地區的主導作用。然而，鑑於印美關係曲折的歷史，揮之不去的不信任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雙方前嫌盡釋，美國認為印度是一個「不情願的合作夥伴」（reluctant partner）；印度則批評美國是不可靠的強權，最鮮明例子即是冷戰時期，美國為與蘇聯競逐，捨棄印度而拉攏共產主義的中國，甚至默許中國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席次。有此前車之鑒，保持「戰略自主」與印度外交政策密切相關，即使「再平衡」政策無疑是印度難得的戰略機遇，亦不能盲目參與「再平衡」戰略，美國必須更認真看待印度的「戰略自主權」（Tourangbam 2014）。

歐巴馬和辛格曾聯合公開發表聲明，印美將提升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層次，尤其是地緣政治、安全和更密集的軍事防務合作，同時樂觀表示兩國關係從未如此刻親密，未來雙方都應該以對方為第一優先合作對象。在表象底下，兩國實則是各懷心思，美國看待印度做為其在必要時以軍事阻止中國崛起的重要對象，催動美國加速制衡中國的「再平衡」政策，為了將印度融入到美國戰略議程與聯盟體系中，美國提供各種政策誘因，包括支持印度大國崛起，建立藍水海軍成為印度洋的優勢力量，使印度軍方依賴美國的技術和裝備，促使印度在堅守「戰略自主」之下，仍無法抗拒向美國傾斜（Jayasekera and Jones 2013）。

學者Colin Geraghty甚至認為印度對於「戰略自主」已到了一種迷戀的程度，儘管美國現階段的戰略規劃符合印度崛起所需，因而促成印美戰略夥伴關係的拉近。但是印度不願妥協的戰略自主權，使得任何爭取印度進行圍堵中國崛起的概念都變的不可行。印度排斥被納進任何針對另一個國家的聯盟或夥伴關係，因此，即便美國和印度越來越重視印度洋地區，然而這樣的共同利益並不一定會導致聯合一致的行動。印度正在尋求做為主要大國的力量與地位，願與所有外部力量進行戰略合作，以防止印度洋地區原有的戰略優勢被稀釋，不過在說服印度與美國走向新聯盟關係時，美國需要耐心堅定的推動與印度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Geraghty 2012, 1-8）。至少目前看來，印度與美國簽署了多項戰略合作協議，在可見的未來卻是不太可能成為盟友，寧願與美國背道而馳以保持其戰略自主（Chandran 2014）。

印度對於「再平衡」政策的回應展現相當一致的「戰略自主」價值，表明「戰略自主」仍然是外交政策不可忽視的驅動因素，印度尋求與美國更密切關係的同時，並無意願傾向與美國建立任何正式的軍事聯盟關係，由此印度以聯盟身分分擔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軍事責任，將不太可能實現。亦即，美國期望和印度各自將東南亞和東亞政策融合起來，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盟應對非民主的中國，從實踐當中檢驗，這樣的戰略合作默契至少到目前為止持續令美國感到失望。

印度並不否認美國是理想的合作夥伴，與美國結盟似乎也是大勢所趨，發展戰略夥伴關係對印度「大國地位」的認可是有正面影響的，欣見美國重新關

注南亞，畢竟若美國退出亞太區域，可能出現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然而，當涉及到實際擁抱美國的大戰略規劃時，印度國內從「戰略自主」角度審慎評估成爲無法迴避的辯論焦點，這當中夾雜著對中國的擔憂、印度對戰略自主權的堅持以及懷疑美國向印度的承諾。

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基本上是回應對中國軍力上升的警戒，印度尋求與美國擴大合作的同時仍顧慮中國的感受，原因在於，印度認爲美中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競逐仍存在損害印美關係的可能性；況且美國重返亞洲之永續性依然未定，無法排除若中國威脅印度利益時，美國是否會真正回應。這些顧慮其實凸顯了美印兩國在某些方面的現實政治目標是虛幻的。

總結而言，進入21世紀以來，因應「中國崛起」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變動，美國提供印度實現其「大國地位」的時機點，「亞洲再平衡」政策是有助益的體系機會。印美關係的癥結點涉及印度關於後殖民國家形象的建構與認知，對印度而言，美國強化對印度關係的背景來自其全球戰略的規劃與調整，尤其是圍堵潛在敵人中國，在此情況下，即便有助於提升印度國際地位，印度也未必願意完全配合美國政策。在「大國地位」身分認同的薰陶下與「戰略自主性」的政策展現，印度認爲美國行事要求應顧及印度的利益。

伍、結論

本文論證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干擾了印度外交政策，導致印美關係往往違背體系規律的預期，此種認同的作用導致印度與美國低於預期的合作，或呈現一種次優的選擇，關於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根深蒂固的影響，來自印度長期認爲美國終將有損戰略自主，使印度更加難以依據結構現實主義途徑制訂政策。再以「亞洲再平衡」案例說明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因素對印度外交政策的干擾作用，印美關係在冷戰後開始修補，基本上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路徑，然而印度並未融入美國的戰略擘劃中，此種抗拒體系的效果必須由單元層次來釐清，本文認爲是很有代表性的測試案例。

更確切而言，身分認同引起的內部競爭和外部刺激促進了民族身分的形成，進而影響和重塑對外政策，體系的權力分配僅僅反映了國家之間權力強弱

對比的結構性矛盾，確立了各國所面對的戰略環境；然而無法針對國家的政策選擇提供充分解釋。從身分認同的作用而言，印度如何協調印美關係，深受印度國家身分認同，以及對美國權力本質和偏好態度為前提條件。本文並非是獨尊認同的作用，而是在於指出身分認同因素與印度外交政策的選擇是密切相關的，能更好的解釋印度偏離體系結構預測的政策行為，釐清印度對美國信任不足的根源。

首先，印度與美國兩個民主國家長期存在緊張關係，癥結不只是在戰略上的分歧與誤解而已，而是更深層的后殖民國家身分認同因素所致。國際體系結構的改變雖然為兩國開啓更廣泛的戰略合作；然而「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一方面觸動印度「大國地位」情節；卻又同時產生抗拒美國提供崛起的契機，延緩崛起的進程，對威脅與機會的判定呈現兩種面向：長期而言，中國是印度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然就現況而言，美國是損毀其「戰略自主性」的最大威脅，所以對於美國提供的體系機會沒有立即把握。

其次，目前美國是印度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兩國之間的雙邊國防貿易也呈逐年上升趨勢，在區域議題上亦具有共同利益與目標，後冷戰時代的政治關係應該顯得不如過去棘手；不過，印美關係仍然跌宕起伏，很大程度是由於印度無法放下冷戰時期被美國因戰略考量而拋棄的陰影。美國的冷戰策略造成印度認為美國並不值得信任，美國反覆無常的政策與動輒對印度的制裁，以及相關經濟援助所附帶的條件，導致印度受到美國的制約，質疑美國侵犯印度對戰略自主的堅持。

再次，相較於將美國視為一個戰略機會，印度反而擔憂美國的戰略擘劃是否將威脅其「戰略自主性」的獨立，躊躇徘徊於是否擁抱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更確切的說，印度領導者也想要擺脫過去歷史記憶的羈絆，並且規劃更符合結構現實主義途徑的政策，帶領印度與美國發展更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或者以更積極的軍事態勢應對中國；然而，總是容易受後殖民認同左右，而忽略現實政治的規則。

最後，就現實主義和認同因素做為政策光譜兩端，印度外交政策時常擺盪在國家安全與戰略自主之間，究竟應該依循現實主義的理性思考，以國家安全為重，抑或秉持國家認同的價值，捍衛「戰略自主性」不接受大國支配，在實

踐上總是不由自主偏向國家認同。

對於後殖民國家身分認同作用的理解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印度戰略方針所顯現的「制衡不足」現象。印度視美國為一個戰略機會或戰略自主，國家身分認同可以提供重要觀察線索。換言之，美國主動為印度提供一個崛起的機會，印度反而擔憂美國此項「善意」將傷害印度的戰略自主性，最大的擔憂是「再平衡」政策可能會迫使印度選邊站，因而限制了外交政策選項。基於戰略自主，印度不想捲入任何非自願性的衝突，或者以任何方式被連結到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政策中，這種不想受到美國支配而產生的政策，對於剛性聯盟選擇長久以來的搖擺與猶疑不定無法抽離國家認同因素。

（收件：105年7月5日，接受：108年4月11日）

Betwee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Strategic Concern: Exploring the India-U.S. Relationship in Post-Colonial Identity

Szu-hsien Le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ien-sze 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long-term and deep impact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objective and develop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e study is conducted using the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ory, which combines analyses on systemic structure and states' behavior at the unit-level, while emphasizing the factor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formation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responses to systemic press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impact of post-colonial identity while analyz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Being a derivative of post-colonial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autonomy therefore help elucidates why India still distrusts the U.S. and why the potential India-U.S. partnership is not fully realized. Still, the post-colonial identity will determine how India defin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whether through strategic opportunity (as a realist approach) or strategic autonomy (as a nationalist approach).

Keywords: India-U.S. Relationship, Post-Colonial Identity, Strategic Autonomy, Neo-Classical Realism

參考文獻

- 方天賜，2014，〈莫迪時期的印美關係發展與展望〉，《戰略安全研析》，115：13-19。Fang, Tian-ci. 2014. Modi shiqi de yinmei guan xi fazhan yu zhan wang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India-US Relations in Modi Govern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15: 13-19.
- 石忠山，2006，〈當代印度憲政體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 (4)：1-30。Shi, Zhong-shan. 2006. Dangdai India xianzheng tizhi [Contemporary Indi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 (4): 1-30.
- 吳俊才，2010，《印度史》，台北：三民。Wu, Jun-cai. 2010. *Yindu shi [A History of India]*.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 李明，2013，〈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年）〉，《遠景基金會季刊》，14 (2)：1-52。Li, Ming. 2013. Oubama zhengfu de chao xian ban dao zhengce [Obama'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2009-2012]. *Prospect Quarterly*, 14 (2): 1-52.
- 李思嫻，2015，〈冷戰後印度「大國地位」的想望：一種幻想、迷思與現實的建構〉，司徒文、陳牧民主編，《南亞新視野：政治發展、國際關係、經濟社會》：87-102，台北：五南。Li, Si-xian. 2015. Zhanhou Yindu daguo diwei de xiang wang: yi zhong huan xiang mi si yu xian shi de jian gou [India's Aspiration for "Great Power Status" in Post-Cold War Era: Expectancy, Myth, and Reality]. In William Anthony Stanton and Chen Mu-min, eds., "*Nanya xin shiye: zhengzhi fazhan, guoji guanxi, jingji shehui*" [*New Vision in South Asi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 Society*], pp. 87-102. Taipei: Wu Nan Books.
- 杜默譯，V. S. Naipaul著，2013，《印度：受傷的文明》，台北：馬可孛羅。Du, Mo, trans., V. S. Naipaul. 2013. *Yindu: shou shang de wen ming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Taipei: Marco Polo Press, Inc.

- 馬加力，2002，《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天津：天津人民。Ma, Jiali. 2002. *Guanzhu yindu jue qi zhong di daguo* [Concerned about India: The Rising Power]. Tianjin: Tianjin Publishing.
- 張淑芳譯，Edward Luce著，2007，《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北京：中信。Zhang, Shu-fang trans., Edward Luce. 2007. *Bu gu zhu shen: xian dai yindu de qi guai jue qi*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4 (2)：53-98。Zhang, Deng-ji. 2013. *Zai ping heng dui mei zhong guanxi zhi ying xiang: yi ge lilun yu zhengce de fen xi* [The Impact of “Rebalancing” on U.S.-China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ory and Policy]. *Prospect Quarterly*, 14 (2): 53-98.
- 陳牧民，2013，〈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9 (3)：155-173。Chen, Mu-min. 2013. *Yindu de zhong guo zheng ce- ying xiang yin su yu xing cheng guo cheng zhi fen xi* [Indian China Policy: An Analysis of Its Factor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9 (3): 155-173.
- 陳琦郁譯，Barbara D. Metcalf and Thomas R. Metcalf著，2011，《蒙兀兒之後—印度五百年的蛻變》，台北：左岸文化。Chen, Qi-yu trans. Barbara D. Metcalf and Thomas R. Metcalf. 2011. *Mengwuer zhi hou- yindu wu bo nian de shui bian* [A Concise History of India]. Taipei: RiveGauche Publishing House.
-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44 (1)：115-135。Zheng, Duan-yao. 2005. *Guo ji guan xi xin gu dian xian shi zhu yi li lun*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Wenti Yu Yanjiu*, 44 (1): 115-135.
- 閻鐵麟，2013，〈從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規畫認識「再平衡」政策〉，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台北：遠景。Yan, Tie-lin. 2013. “Cong mei guo ya tai di qujun shi bu shu zhi gui hua ren shi zai ping heng zheng ce” [Understanding the ‘Rebalancing’ Policy from

the Planning of Military Deployment in the US Asia-Pacific Region]. In Bao, Zong-he ed., “*Mei guo zai ping heng zheng ce dui dong ya ju shi zhi ying xiang*” [*The Impact of US ‘Rebalancing’ Policy on the Situation in East Asia*]. Taipei: The Prospect Foundation.

Ashizawa, Kuniko. 2008.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0 (3): 571-598.

Athwal, Mardeep. 2008. *China-India Relations: Contemporary Dynamics*. London, UK: Routledge.

Ayres, Alyssa, Charles R. Kaye, and Joseph S. Nye. 2015. “A New Indo-US Partnership Model.”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a-new-indo-us-partnership-model/#sthash.b7tCOgkx.dpuf> (May 04, 2016).

Bajpai, Kanti. 2008.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a Better World.” *South Asian Survey*, 15 (1): 33-47.

Banerjee-Guha, Swapna. 2011. “Post-September 11 Indo-US Strategic Ties: Locating Power and Hegemon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77 (3): 223-227.

Brewster, David. 2012. *India as an Asia Pacific Power*. New York, NY: Routledge.

Burgess, Stephen. 2013. “A Pivot to India? The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Multipolarity in Asia.” <https://www.usafa.edu/app/uploads/Burgess-A-Pivot-to-India-15-Apr-2014.pdf> (May 30, 2019).

Chacko, Priya. 2011. “The 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t: Pursuing an Ethical Modernity with Jawaharlal Nehru.” In Robbie Shilliam,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on-Western Though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Investigations of Global Modernity*, pp. 179-196.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cko, Priya. 2012.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Identity from 1947 to 2004*.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ndran, Suba. 2014. “Pivot, Rebalance and What Next?” <http://www.ipcs.org/article/pakistan/pivot-rebalance-and-what-next-4337.html> (July 17, 2015).

Chanramohan, Balaji. 2013. “QDR 2014 and the Evolving US Grand Strategic

- Approach in the Indo-Pacific.” <http://www.futuredirections.org.au/publications/indian-ocean/1498-qdr-2014-and-the-evolving-us-grand-strategic-approach-in-the-indo-pacific.html> (June 15, 2014).
- Ciorciari, John D. 2011. “India’s Approach to Great-Power Status.”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35 (1): 61-89.
- Clinton, Hillary.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89: 56-63.
- Commuri, Gitika. 2010. *Indian Identity Narra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New Delhi, India: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 Craig, Kern W. 2013. “What D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Have in Common: Enough for a Strategic Alliance?” *Asian Social Science*, 9 (2): 70-98.
- Curtis, Lisa. 2008. “U.S.–India Relations: The China Factor.”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8/11/us-india-relations-the-china-factor> (June 24, 2015).
- Donnelly, Jack. 2009. “Realism.” In Scott Burchill,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1-56.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Fang, Tien-sze. 2014. *Asymmetrical Threat Perceptions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nel, Bernard. 2001/2002. “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 State Level, Variables and Progressivity in Realist Research Program.” *Security Studies*, 11 (2): 212-218.
- Gandhi, Jegadish, ed. 2007. *India and China in the Asian Century: Global Economic Power Dynamics*. New Delhi, India: Deep & Deep Publications Pvt. Ltd.
- Garver, John W. 2003. “Asymmetrical Indian and Chinese Threat Perceptions.” In Sumit Ganguly, ed., *India As An Emerging Power*, pp. 109-134. London, UK: Frank Cass Publishers.
- Geraghty, Colin. 2012.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Re-calibrating U.S. Expectations.”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ASP%20Reports/Ref%200091%20-%20India%20in%20the%20Indian%20Ocean%20Region.pdf> (May 30, 2019).

- Gupta, Arvind. 2013. "America's Asia Strategy in Obama's Second Term." http://www.idsa.in/idsastrategiccomments/AmericasAsiaStrategyinObamasSecondTerm_agupta_210313.html (October 06, 2017).
- Hilali, A. Z. 2001. "India'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t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sian Survey*, 41 (5): 737-764.
- Jain, B. M. 2004. "India-China Relations: Issues and Emerging Trends." *The Round Table*, 93 (374): 253-269.
- Jayasekera, Deepal, and Keith Jones. 2013. "Obama and Singh Pledge Major Increase in US-Indian Military-Strategic Ties." <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3/09/30/indi-s30.html> (July 23, 2016).
- Kazmin, Amy, and Geoff Dyer. 2016. "Modi looks to Obama as India Seeks Membership of Nuclear Club." <http://www.ft.com/cms/s/0/71167174-2acb-11e6-a18d-a96ab29e3c95.html> (February 02, 2018).
- Kitchen, Nicholas. 2010. "Systemic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6: 117-143.
- Kux, Dennis. 1993.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tranged Democracies 1941-199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Lobell, Steve E.,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hbubani, Kishore. 2011. "The Not-So-Surprising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 (2): 221-226.
- Malik, Mohan. 2001. "South Asia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acific Review*, 13 (1): 73-90.
- Mehta, Pratap Bhanu. 2009. "Still Under Nehru's Shadow? The Absence of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s in India." *India Review*, 8 (3): 209-233.
- Mehta, Pratap Bhanu. 2011. "Reluctant In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22 (4): 97-109.

- Mehta, Simi. 2014. "Rebalancing: Part of its Grand Strategy?" <http://www.ipcs.org/article/china/rebalancing-part-of-its-grand-strategy-4443.html> (April 16, 2015).
- Menon, Shiv Shankar. 2010. "Maritime Imperative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Speech at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 *Maritime Affairs*, 5 (2): 15-21.
- Miller, Manjari. 2013. *Wronged by Empire: Post-Imperial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Manjari Chatterjee. 2014. "Foreign Policy à la Modi: India's Next Worldview."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095/manjari-chatterjee-miller/foreign-policy-a-la-modi>. (January 15, 2018).
- Mohan, C. Raja. 2007.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India's Struggle with Democracy Promo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0 (3): 99-115.
- Mohan, C. Raja. 2013a. "India: Betwee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Geopolitical Opportunity'." *Asia Policy*, 15: 21-25.
- Mohan, C. Raja. 2013b. "China's Rise, America's Pivot, and India's Asian Ambiguity."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1/31/china-s-rise-america-s-pivot-and-india-s-asian-ambiguity> (March 21, 2015).
- Mohan, C. Raja. 2016. "Raja Mandala: After the US Entente."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us-india-foreign-policy-pakistan-china-2851090/> (September 09, 2017).
- Mondal, Anshuman A. 2003.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India and Egypt*. New York, NY: RoutledgeCurzon.
- Ogden, Chris. 2011. "International 'aspirations' of a Rising Power." In David Scott, ed., *Handbook of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13. London, UK: Routledge.
- Ollapally, Deepa, and Rajesh Rajagopalan. 2011. "The Pragmatic Challenge to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4 (2): 145~162.
- Ollapally, Deepa. 2013. "India's Response to the U.S. Rebalance." In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ed., *Balancing Acts: The U.S. Rebalance and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llapally, Deepa. 2014a. "Identity and Strategy in India's Asia-Pacific Policy."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25: 135-149.

Ollapally, Deepa. 2014b. "India's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Contestation: What Reactions to the 'Pivot' Tell Us." <http://www.theasanforum.org/indias-evolving-national-identity-contestation-what-reactions-to-the-pivot-tell-us/> (August 09, 2018).

Paal, Douglas. 2012.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11: Obama Determined to Bring America 'Back' to Asia." *Asian Survey*, 52 (1): 6-14.

Panetta, Leon E. 2012. "The U.S. and India: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82> (June 12, 2017).

Pant, Harsh V. and Yogesh Joshi. 2016. "Indo-US Ties in the Age of 'Pivot'." In Harsh V. Pant and Yogesh Joshi, eds., *The US Pivot and Indian Foreign Policy: Asia's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pp. 38-59.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Rao, Nirupama. 2013. "India's Ambassador to the U.S., America's 'Asian Pivot': The View from India." <http://watson.brown.edu/events/2013/honorable-nirupama-rao-americas-asian-pivot-view-india> (April 12, 2014).

Rathbun, Brian. 2008.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17 (2): 294-321.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 144-172.

Sahgal, Arun. 2012. "India and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for Asia-Pacific." http://www.idsa.in/idsacomments/IndiaandUSRebalancingStrategyforAsiaPacific_asahgal_090712 (December 23, 2015).

Sajjanhar, Ashok. 2016. "Narendra Modi's Foreign Policy: Hits and Misses of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6/01/narendra-modis-foreign-policy-hits-and-misses-of-2015/> (October 24, 2017).

- airiti
- Scott, David. 2012. "The 'Indo-Pacific'-New Regional Formulations and New Maritime Frameworks for US-India Strategic Convergence." *Asia Pacific Review*, 19 (2): 85-109.
- Singh, Nitya. 2012. "How to Tame Your Dragon: An Evaluation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India Review*, 11 (3): 139-160.
- Singh, Udhir Kumar, ed. 2011. *Sino-Indian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21st Century*. New Delhi, India: Pentagon Press.
- Sterling-Folker, Jennifer.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Identity: Peril Despite Profi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Steven E. Lobell, Steven E. Lobell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p. 99-138.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0/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128-161.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6.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15 (3): 464-495.
- Taliaferro, Jeffrey W., Steven E. Lobell, and Norrin M. Ripsman. 2009. "Introduction: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In Steve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p. 1-41.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akur, Ramesh. 1992. "India after Nonalignment." *Foreign Affairs*, 71 (2): 165-182.
- Tharoor, Shashi. 2006. *India: From Midnight to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New York, NY: Arcade Publishing Inc.
- Tourangbam, Monish. 2014. "Rebalancing: Where Does India Figure?" <http://www.ipcs.org/article/us-south-asia/us-in-asia-pacific-rebalancing-where-does-india-figure-4435html> (November 13, 2016).
- Twining, Daniel, and Richard Fontaine. 2011. "The Ties that Bind ? U.S.-Indian Values-based Cooper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4 (2): 205-195.

- Upadhyay, Shreya. 2014. "India-US: DTTI and India's Quest for Self Reliance." <http://www.ipcs.org/article/us-south-asia/india-us-dtti-and-indias-quest-for-self-reliance-4417.html> (March 03, 2015).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Defense Pentagon.
- Vinod, M. J. 1997. "Indi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Analysis*, 20 (3): 439-449.
- Wang, Shuying, and B. R. Deepak, eds. 2012. *India-China Relations: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New Delhi, India: Manak Publications Pvt. Ltd.
- Wohlforth, William C. 2008. "Re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Steve Smith Amelia Hadfield and Tim Dunne, eds.,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and Cases*, pp. 31-4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